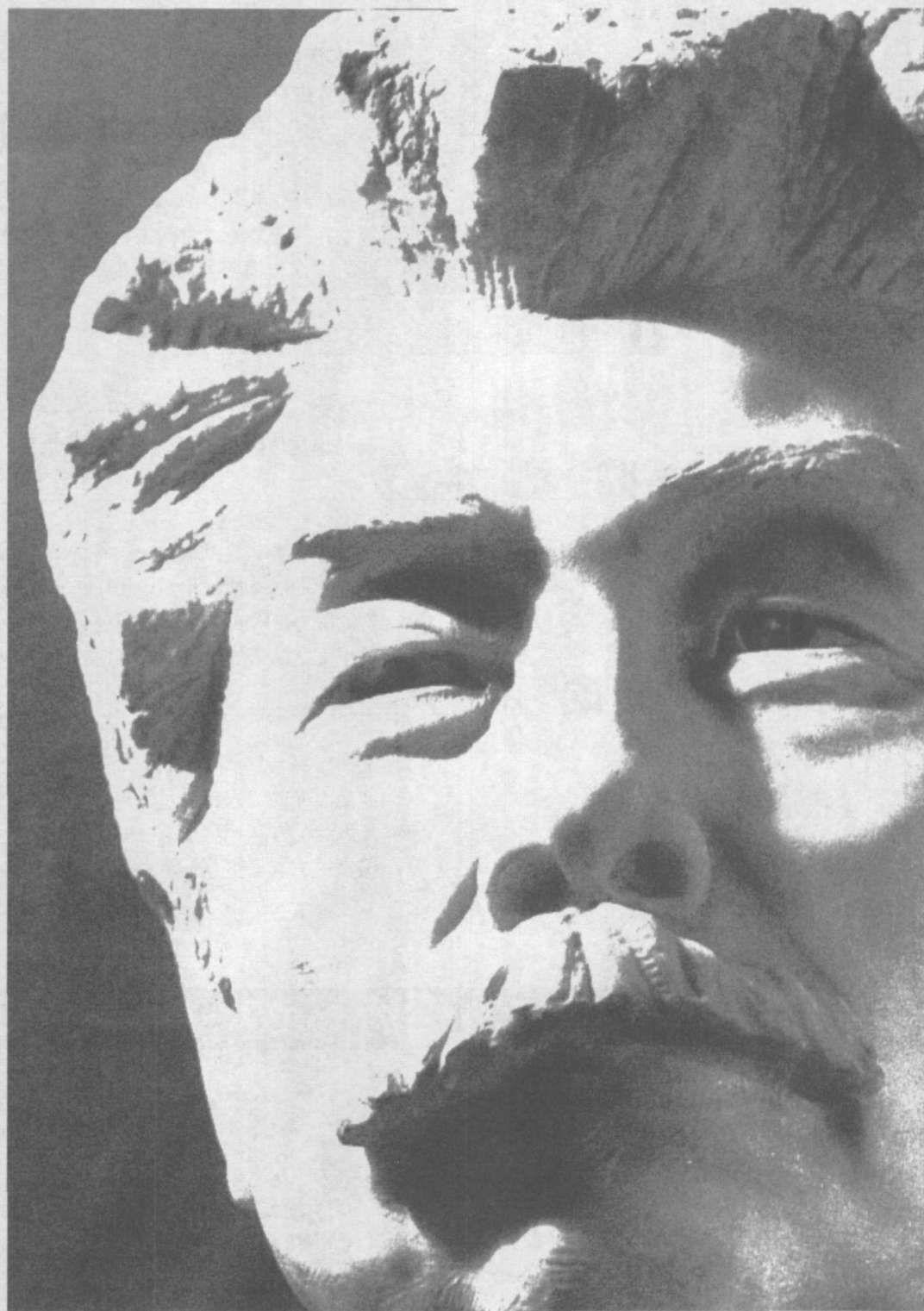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文人的四种面相

□ 杨春时



自古以来，中国文人大抵追求三种境界：鸿儒、学者、名士。到了现代，受西方文化影响，又产生了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——思想家。这四种境界也成为四种模式，塑造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。

儒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通称，但主要指服膺孔孟学说，以道德教化、辅佐王业为使命的读书人。严格地说儒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；儒不是学者，学者是创造知识的，儒是搞意识形态的；儒又不是思想家，思想家是创造新价值观念的，儒则是传统价值的守成者。中国文人以儒为主体，这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倾向和保守性质。鸿儒是有成就、有权威（通常为官方认可）的儒者，他们也有渊博的“学问”，但主要是经学知识，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则知之甚少，并且视为雕虫小技而不屑一顾。鸿儒以圣人传人和帝师自命，实际上思想保守、不通时务，更兼愚忠愚孝，是高级奴才、思想和人格上的侏儒。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声名显赫的鸿儒，儒学宗师孔孟自不必说，董仲舒、司马光、程、朱、陆、王等，他们的“功绩”就是阐释、强化了孔孟之道，其阻滞文化思想进步的负面作用恐怕要比起其贡献更大。鸿儒令人敬畏，但绝不可爱，头脑冬烘，古板方正，道学气（往往是假道学）十足，简直是被抽干了血肉的理性木乃伊。中国的鸿儒和西方的神学家，都是一种文化怪胎，绝非正常人格。

清末新政废科举、兴新学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，儒失去立身之基，终于灭绝，而被新型知识分子取代。虽然还有遗老遗少、新儒家等，但已不

成气候。但是，鸿儒作为一种文人模式并未灭绝，它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塑造出现代鸿儒。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，投身社会革命，成为革命理论的宣传、阐释者。及至革命成功，革命导师和领袖的著作被奉为“经典”，一些革命知识分子乃以注经方式研究、阐释经典，于是就有教条主义出现，并且独尊一家之说，禁锢思想，压制创造，遂由革命者变成了现代鸿儒。这些现代鸿儒拒绝接受现代科学知识和价值观念，死守教条，脱离实际，因而成为“左”的思潮的代表人物，在改革年代成为改革的阻力。但是，总的来说，改革开放洪流已经淘汰了现代鸿儒，并且摧毁了其社会基础，陈腐的说教已经没有人听，这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海内外一批新的鸿儒鼓噪起复兴儒学的浪潮，企图以孔孟之道作为现代中国人的主导思想。尽管明眼人都看出这场闹剧不会得逞，但这种开历史倒车的文化思潮应当给予批判。

前面已经说过，学者不同于鸿儒，《晋书》称：“鸿儒硕学，无乏于时”，可见二者有别。儒是文人的主体，学者是文人的支脉。科举考试于经学之外，另设博学鸿词科，算是对学者有限度的承认。学者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。学者以求知为天职，献身学术，淡泊名利，保持着独立人格，远非那班汲汲功名的儒生可比。学者有真才实学，治学严谨，贯通古今，也远非那班头脑冬烘的腐儒可比。学者是中国文化真正的创造者，中国文化典籍浩如烟海，但多为伦理说教，有知识价值的那一部分就是学者的创造。在重伦理、轻知

识的文化环境中，仍然有绵延不绝的学者传统，给中国文化保存了一脉生气。《原始思维》一书作者列维·布留尔对中国文化大加贬斥，认为全是经学胡说。但他不知道中国还有司马迁、许慎、刘勰以及张衡、祖冲之、李时珍这样的古代学者，以及章太炎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钱钟书等近现代学者。只有这些学者，才堪称中国文化的代表，可惜长期以来他们被轻视、被埋没了。

学者为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可作为中国文人楷模。但学者也有其短处，一是知识专门化，局限于具体学科领域，往往缺乏贯通天地人生的大智慧、大学问、大思想，他们太多书呆子气，往往与社会隔绝；二是立身严谨、清贫辛劳，未免活得太累、太苦。

旧中国留下一批学者型文人，解放后又培养出一批学者，他们在经济、政治环境都不宽松的条件下，兢兢业业，孜孜矻矻为国家民族奉献一生，真是可敬可叹。及至“文革”结束，改革开放，“臭老九”政治上翻了身，但仍然吃不开，在权势与财富面前，学者形象黯淡无光，虽然社会调查显示，学者列为受人尊敬的职业前列，但愿意做学问的人却不多，还是因为他们活得太累、太苦。传统社会是官僚社会，学者没有地位；现代社会是商业社会，学者仍然没有地位。大约社会就是这样，需要有这样一种人，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奶和血。学者的奉献与社会的回报远远不对等，唯一可以安慰的是，他们独享求知的快乐，拥有最大的财富——知识。这一点，就是高官大贾也不敢轻慢的。

也许是嫌鸿儒太假道学，学者太

苦太累，于是就有第三种文人——名士。名士是读书人中的非正统派，他们不务经学、不求仕进，而且学不必专、业不必精，但才华过人，更兼本性风流，不受礼法拘束，或忘情山川，或留连诗酒，乃至偷香窃玉、放浪形骸，虽然惊世骇俗，但由于出自真性情，又被过人才华所遮掩，于是无行变成了美谈。名士瞧不起鸿儒，也不愿做学者，李白嘲笑“寻章摘句老雕虫”，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，竹林七贤非圣无法。他们不愿走传统文人的道路，宁愿做社会的边缘人物。不过，名士反潮流，有点像现代西方的嬉皮士，仅限于生活方式上，而不是思想上的异端，他们还不具备造反的思想武器，因而只能抒个人之愤懑，不能颠覆整个文化制度。也正因为名士并无大害，统治者虽不喜欢，但也能容忍，甚至收买笼络，由此也出现不少走终南捷径的假名士。尽管如此，名士毕竟有了自己一块自由的精神领地，他们活得洒脱多了。“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”，是何等豪爽！“今宵酒醒何处，杨柳岸晓风残月”，又是何等令人神往！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该是多么超脱！甚至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”也令人艳羡。无怪乎连那些皓首穷经的腐儒、孤寂苦熬的学者也羡慕名士，甚至也时常作名士状呢。只可惜名士风流一世，甚至名传后世，但无补于当世，既不能安邦治国，又少著书立说，难免虚掷青春才华，最后落得一个“空”字。但真名士大多会留下一些精神财富，特别是文学艺术遗产。他们的特立独行、异端思想往往会在文艺上结出果实，而名士也

大抵以文艺才能闻名于世。像杜牧、八大山人、唐伯虎、曹雪芹乃至徐志摩、李敖等都是具有巨大艺术成就的真名士。

解放以后，名士绝迹。在“左”的思潮高压下，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地改造，夹起尾巴做人，安敢风流？改革开放以来，禁锢既松，名士之风大起。大家都不想活得太累，要多一分情趣，少一点束缚。于是玩文学、玩学术、玩人生，潇洒风流不逊古人。只是当今假名士多，真名士少。这些现代名士往往才学不足，更缺少真性情，一玩就露出浅薄来。真名士要有真才学、真性情，至于学者依高官、明星傍大款，作家换情人，恐怕不是真风流，不会留下千古佳话。中国需要有名士，但要真名士，不要假名士。中国的文学艺术既需要严肃的作家来进行深刻的思考，也需要一些有真性情的名士创作出有神韵的作品。由于理性主义的重负，中国作家严肃有余而浪漫不足，人格的解放和性情的自由发展是中国作家和文艺繁荣的首要条件。

思想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模式，不是中国的土产，而是舶来品。中国古代很少有人能称得上思想家，因为思想家最基本的品质是对现实的批判意识，能够创造新的价值观念，犹如学者能够创造新的知识。中国文人没有批判意识，只知道遵守圣人之教。老子、庄子、孔子、墨子等作为中国文化的奠基者，应该有大思想家的地位，可惜到了后代就渐渐绝了种，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恶果。孔子作为思想家这个称号也要大打折扣，因为他“述而不作”，多为阐释发扬周文化，独创变革甚少。后来的儒学

门徒更等而下之，像退化的马铃薯一样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因此，中国有鸿儒，有学者，有名士，但缺少思想家。思想家是社会、文化前进的火车头。欧洲走出中世纪，进入近现代文明，除了生产力的发展以外，还倚仗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家，像卢梭、伏尔泰、康德、黑格尔、马克思、尼采、胡塞尔、海德格尔、萨特等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，文化变革缓慢，也因为缺少大思想家，缺乏对抗儒学的新思想。及至近现代，西方文化传入，传统文化衰落，就有服膺西方文化的新思想家出现，如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、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等。他们呐喊战斗，振聋发聩，几乎颠覆了传统思想，把社会推向变革。中国现代思想家有些先天不足，他们缺乏传统文化的“支援意识”，思想取自外国，奉行“拿来主义”，往往只能阐释宣传新思想，而不能创造新思想。中国未有世界级大思想家，根源也在这里。在“左”的思潮禁锢下，现代迷信盛行，思想被扼杀，更难有思想家出现和存在。顾准也许称得上是唯一的思想家，可惜未及有成就便被扼杀了。思想解放、改革开放，新思想新文化引进，于是像五四运动一样又涌现出大批思想家，他们推动文化变革、社会进步功不可没，只是仍然先天不足，阐释介绍多，创造发明少，思想仍然是外国人的，因此仍未有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出现。尽管如此，思想的花朵毕竟开放了，在中国的深厚肥沃的土地上，它迟早会结出自己的果实，中国的大思想家应当在不久的将来出现。

（作者单位：厦门大学）